

后三国

梁末北迁士人研究

洪卫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三国

梁末北迁士人研究

洪卫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研究 / 洪卫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000 - 0

I. ①后… II. ①洪…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0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张 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综述	(7)
三 研究思路	(12)
第一章 后三国梁末政治格局	(15)
第一节 南北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后三国的形成	(15)
一 北魏末期的政局	(15)
二 东魏、西魏的建立	(17)
三 后三国的鼎立	(17)
第二节 侯景之乱与部分梁末士人入北	(22)
一 侯景反叛东魏	(22)
二 梁武帝对外政策与侯景降梁	(24)
三 侯景乱梁与建康陷落	(26)
四 侯景之乱的影响	(28)
第三节 萧绎与江陵政权的建设	(31)
一 梁宗室的皇位之争	(31)
二 江陵政权的建立、建设及其在南北政局中的地位	(40)
第四节 江陵政权的覆灭与江陵部分士人入北	(41)
一 江陵政权的灭亡	(41)
二 江陵政权破亡后的士人分流	(67)

第二章 对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文化上的认识	(73)
第一节 南北文化的交流	(73)
一 南北文化交流的方式	(73)
二 南北文化交流的内容	(86)
三 南北文化交流的原因	(90)
第二节 后三国政权下“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	(92)
一 颜之推出仕北朝的矛盾心理	(93)
二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颜氏家训》解读	(97)
第三节 西魏北周政权下的“江陵士人集团”	(102)
一 南北文化的融合者——以庾信、王褒为中心的考察	(102)
二 梁末北迁士人在魏周的生活和地位	(107)
三 梁末北迁士人的忠君思想与节操意识	(109)
第三章 对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心理上的探究	(119)
第一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乡国之思	(119)
一 乡国之思的存在	(119)
二 乡国之思的对象	(121)
三 乡国之思的表现	(125)
四 乡国之思的成因	(127)
第二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羁旅心态	(129)
一 羁旅心态的表现	(129)
二 羁旅心态的成因	(131)
第三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史家意识	(134)
一 史家意识的表现	(134)
二 史家意识的成因	(138)
第四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隐逸心理	(141)
一 隐逸心理的表现	(141)
二 隐逸心理的成因	(147)
第五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宗教情结	(151)
一 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信仰概况	(151)
二 梁末北迁士人对佛教、道教的信奉	(153)
三 宗教信仰对梁末北迁士人的影响	(158)

第六节 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对社会的关怀	(160)
一 对下一代成长的关注	(160)
二 对文化发展的关心	(165)
三 对百姓生命的关怀	(165)
四 对社会风俗的匡正	(166)
五 积极从事公益性事业	(167)
第七节 参与北朝政权建设的主体意识	(168)
 第四章 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的活动	(176)
第一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仕宦生活	(176)
一 在北齐的仕宦生活	(176)
二 在北周的仕宦生活	(190)
第二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文学活动与学术研究	(207)
一 在北齐的文化活动	(208)
二 在魏周的文化建设	(214)
第三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其他社会活动	(222)
一 在北齐的社会活动	(222)
二 在北周的社会活动	(225)
第四节 梁末北迁士人与北朝士人的微妙关系	(231)
一 南方士人眼中的北朝士人	(232)
二 北朝士人眼中的南方士人	(238)
 第五章 北朝对梁末北迁士人的改造	(245)
第一节 对梁末北迁士人心理的重塑和利用	(245)
一 对北迁萧梁宗室成员的优崇	(245)
二 对北迁高门大族和才华卓绝者的拉拢	(251)
三 对一般北迁士人的利用	(257)
四 对有专门技艺者的驾驭	(261)
五 对其他北迁人士的利用和奴役	(264)
六 对北迁士人的普遍控制	(266)
第二节 对梁末北迁士人生活上的关怀	(267)
一 精神上的慰藉	(267)

二 物质上的赠赐与优待	(270)
三 生活上的安排	(272)
第三节 对梁末北迁士人文化上的尊崇	(276)
一 西魏、北周对梁末北迁士人文化上的尊崇	(276)
二 北齐对梁末北迁士人文化上的优待	(279)
第四节 北朝统治者对梁末北迁士人“用”中之“鄙”	(281)
第六章 梁末北迁士人入隋沉浮	(286)
第一节 梁末北迁士人入隋后的变化	(286)
一 隋的建立和入隋的梁末北迁士人	(286)
二 梁末北迁士人入隋后的地位改变	(288)
第二节 隋对陈亡后北上南方士人的态度	(301)
一 陈亡后北上的南方士人	(301)
二 隋对陈亡后北上南方士人的态度	(305)
结 语	(317)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30)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分裂割据是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三国时期，即前三国和后三国。前三国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魏、蜀、吴鼎立，后三国出现在南北朝后期，指梁（陈）、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个政权的对立。相比较而言，后三国是动态的三国，它由梁、东魏（北齐）、西魏的对立转向陈、北齐、北周的对峙。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三国时期看作由两个三国阶段组成，即第一阶段的梁、东魏（北齐）、西魏三方鼎立和第二阶段的陈、北齐、北周三方鼎立。

魏、蜀、吴三国众所周知，而“后三国”称谓及其历史人们却知之甚少。对南北朝后期这种三国格局的认知始于当时人，如庾信在《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指出：“太祖以百二诸侯，三分天下。”^①《陈书·孔奂传》也称：“世祖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周书·杜杲传》亦载：“今三方鼎立，各图进取，苟有衅隙，实启敌心。”其后唐史臣令狐德棻也持相同看法：“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②随后唐朝丘悦更以“三国”来称谓这一时期，并将所撰有关这一时期的史著名为《三国典略》。清人王鸣盛也以“天下再三分”概括这时期的三分局势。^③这样，南北朝后期的“三国”概念也就渐渐凸显。今人牟发松先生不仅以“后三国”来指代这历史时期，还给出

①（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2页。

②《周书》卷16《侯莫陈崇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71页。

③（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

了详尽的考察。^①至此,“后三国”概念便被学界所使用。^②

北魏永熙三年(534)七月,孝武帝元修不堪忍受高欢淫威逼迫逃往关中寻求宇文泰的支持,然此举非但未能为孝武帝带来好运,还使北魏从此走向分裂。高欢在孝武帝逃走后,于同年十月另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而立足关中的宇文泰则藉孝武帝的到来开始了分割北魏的另一政权建设,不久即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北魏从此分为东魏和西魏。这样,当时的南北政局就由梁和北魏的双方对峙演变为梁、东魏、西魏的三方鼎立,后经侯景之乱的催化,梁、东魏(北齐)、西魏的对峙又演变成陈、北齐、北周三分天下之格局。但陈、北齐、北周的对峙(557—577年)非常脆弱,实力强弱对比明显,所以577年实力上升的北周利用与陈的外交联盟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之后以禅让方式取代北周的隋政权又在589年灭陈,统一了中国。

在梁、东魏(北齐)、西魏鼎足而立演变为陈、北齐、北周三方对立以及北周迅速强盛超过北齐并最后灭掉北齐的过程中,梁江陵政权的兴亡在其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王光照认为:“梁季……建康陷落之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力资源走上历史前台,乃是荆州暨江陵政治地理地位对于时局演变的必然选择,江陵上升为梁季最高政治中心,并成为建康士族子遗的栖息地。”^③江陵政权的建立,说明了一方面侯景之乱后梁政权虽有损伤,但其制度、社会统治基础、机构的职能作用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侯景之乱后的南方社会它能够规定梁人社会心理指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起来稳固人心、凝聚梁统治阶层力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江陵政权的建立缓解了东魏(北齐)和西魏的进一步南侵,使梁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使南方文化学术得以保持它的特质并有所发展。然而因梁元帝个人诸多因素和江陵政权内、外政治环境等变量的作用,江陵政权仅短暂地维持了几年便于承圣三年(554)被西魏宇文泰所灭。

① 参见牟发松《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三分之局试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② 此外,网络文学作品穆禾车的《南北朝后三国鼎立时代的绝世勇将——西魏四猛兽》(<http://club.book.sohu.com/bophp?c=10&b=history&a=340146>)也使用了“后三国”这一概念。

③ 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江陵政权的灭亡为东魏特别是西魏的发展强盛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时人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即说：“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①可以说，江陵政权的兴亡不仅成为魏周政权较快强盛起来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三国乃至整个南北朝政局发生改变的历史性转折点。江陵政权的灭亡，不仅使梁政权丧失了诸多领土、人口和财富，更使梁政权及其以前的文化学术建设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分流：不仅梁的诸多文物、典籍被西魏掠夺，而且大批士人被西魏掠走。这些士人转而在魏周政权下生活下来，在新的环境里从事文化活动，把南方文化带到北方，与关右文化相结合，增加了北朝文化的丰富和璀璨。

陈寅恪先生指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期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②

诚如是。笔者以为，其中“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陈继统梁并有所发展的部

① 《庾子山集注》，第165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页。

分；二是江陵政权所继承的部分。后一部分是对整个梁代及其以前一直上溯到王肃北奔时全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和陈继统梁的那部分多少有所区别。另外，因为“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①，所以当西魏灭江陵时即把江陵所有文物典籍全部掠去，^②又将江陵城数十万人士掳掠关中，这一切为西魏、北周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麟趾殿校书，虽不能说它是以北迁江陵士人为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江陵士人和南方文化的影响。首先，麟趾殿所校之书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江陵政权所掠得。其次，不仅周明帝和部分北周诸王深受庾信、王褒等的影响，其他北周权贵和士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些北迁士人的文化思想影响。最后，麟趾殿校书人员中有不少江陵士人。而在北周其他文化建设方面，梁末北迁士人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周明帝时即诏明克让、庾季才“及诸日者，采祖暅旧议，通简南北之术”^③，造成《明克让历》；周武帝时又让明克让“与太史官属正定新历”^④。同时庾信、裴正还参与了北周的制礼作乐等。可以说，西魏、北周的文化建设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南方文化输入融合萌发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对江陵的掠夺，才有西魏文化典制的全面建设。所以陈先生所谓隋唐渊源的第三部分即“（西）魏、周”的那部分其实也包含了南方梁文化成分。这点笔者将在书中进一步阐明。

江陵政权的灭亡，标志着梁政权实质上已不复存在，其后的梁政权不过是为权臣所控制利用的短暂政治工具（萧督的梁政权同样不过是西魏的附庸，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梁政权的延续），最后只能消亡于权力斗争之中。从江陵被掠到关中的南方士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们在魏周仕宦生涯怎样，他们在西魏、北周又有哪些活动，他们被虏后心理及思想有何变化，他们对后来的历史有怎样的影响，还有江陵政权陷落后，由关中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页。

② 《周书》卷15《于谨传》：“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举笔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第248页。

③ 《隋书》卷17《律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8页。

④ 《隋书》卷58《明克让传》，第1415页。

奔北齐的颜之推以及在侯景之乱前后奔北齐的南士情况又怎样？这些就如同江陵政权被灭后在历史上就陷入沉寂一样，很少有人再去探究，让人不能不发出黄花落后无人问的感慨。

目前“士人”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江陵政权陷落后入北的梁末士人也开始为人关注，但对他们的研究目前多是从个体角度开展的，把他们作为群体对象来考察的较少，而从整体上、系统地进行研究的成果目前暂未出现。本书试图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补缺。

因为入隋后还有江陵士人在活动，为便于阐明梁末入北士人的社会变迁，这里有必要就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时间和概念作简要说明。

从严格意义上说，后三国时期应该是指自永熙三年（534，梁中大通六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开始，到建德六年（577，北齐承光元年、陈太建八年）北周灭北齐为止的一段时期。但一如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结束，人们认为是在太康元年（280）即西晋灭吴统一中国时，从宽泛意义上说，后三国时期下限为开皇十九年（581）隋灭陈统一中国。本书所指后三国即是就其宽泛意义而言，研究中“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主要是指侯景之乱爆发到陈政权建立（557年，陈永定元年）期间梁政权中进入北方的南方士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侯景之乱入北齐的一批士人和梁承圣三年（544）西魏军队灭江陵俘虏入北的江陵士人群体。另外，本书还简略地涉及了南朝陈灭后部分南方北迁士人的命运，目的是把他们与由北周进入隋政权的梁末北上的南方士人作一比较，以更清晰地显示梁末北迁士人的总体命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士人”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与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士族密切相关。魏晋士族是秦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共同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它与世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为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如果就

社会阶层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① 张爱波则认为：“世族的特征一般指累世为官，德业相继的大家族”，而“士族这一阶层最广泛，包括了势族、世族和名望之士”。^② 只是“名望之士”还是让人感觉模糊。中国台湾学者毛汉光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认为：“本书暂定两个辨别士族的标准，作为研究的基础。即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同时合于这两个条件者，视为士族。”^③ 后来他又加以补充，认为士族还“包含柳芳所说的郡姓、虏姓、吴姓；亦包括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还包括一切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④。汪征鲁则把魏晋南北朝自由民以上的社会划分为高门、一般士族、寒门三个等级，并给出了五条划分标准。^⑤ 由上可见，对“士族”一词，史学界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界定和划分标准。本书所持士族观点是综合性的，但更倾向于唐长儒先生的，认为士族分为高门大族和一般士族。高门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层，中正品第，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⑥，应当包括田先生所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唐先生所言一般士族即“士族低层”，包括因宋元嘉二十七年（450）颁布的七条准则而跻身士族行列的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毛汉光先生所划分的与“士族”相对的“小姓”^⑦ 在内。另外本书的士族还包括毛汉光先生所言“柳芳所说的郡姓、虏姓、吴姓”在内。本书之所以要对士族作界定，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士族是本书所言士人最主要的来源，但魏晋南北朝“士人”并不等于士族，这一时期由庶族上升的皇室成员、富商大贾（如本书提到的梁时的何妥）、庶族寒门（包括毛汉光先生所说的“寒素”，即“《晋书·李重传》中荀组尝曰：‘寒素者。当唯寒门身素，无世祚之资也。’”^⑧）皆可视为这一时期的“士人”。基于此，本书的“士人”概念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

② 张爱波：《西晋“世族”、“势族”及“士族”之考辨》，《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

③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湾中国学术奖励委员会1966年版，第4—8页。

④ 毛汉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4页。

⑤ 参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⑥ 唐长儒：《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⑦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4—8页。

⑧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4—8页。

比较宽泛，主要包括：其一，出身于士族，包括高门大族和一般士族；其二，为寒门，包括毛先生所言“寒素”；其三，包括某些特有知识之人，如从事医学的、与士族交游的学问僧及学问道士等。这和余英时先生的“士”的观点，即“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有时则不尽限于‘官僚’”^①略同。

二 研究综述

对魏晋南北朝士人的研究，前贤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如唐代林宝所著的《元和姓纂》即对著名的门阀士族家世作了系统的研究，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之《宰相世系表》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里对这一时期士人也有所涉及。但这些都非以迁徙士人为研究对象。

到明清时，学者对南北迁徙士人开始有所关注。相关的有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笔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但其中的研究也只涉及个别的或少数的士人评论，也非以北迁士人为群体对象。

民国以后对士人研究有一定的扩大，特别是当前史学界对士人研究有突破性进展，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不少（见下文）。但遗憾的是，对梁末或江陵北迁士人的群体研究依然不理想。除了对庾信和颜之推研究较丰之外，对其他人的研究很少甚至没有。有的即使涉及这部分内容也只是在研究论文或专著里稍作提及。专门进行江陵政权或江陵士人或梁末士人研究的专著目前尚未出现。其原因大致有四：其一，江陵政权存在时间较短，前后只有四年。即使从侯景之乱算起，也就是太清二年（548）八月到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才七年。而且这七年江陵政权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它所实际统治的范围也很小，士人在此期间的活动也不显著。其二，江陵政权灭亡后，北迁士人除了颜之推、庾信和王褒留下了著作或文集以及少数的士人还存有零星的几篇诗文之外，其余士人也就只有正史上对他们的记载，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记载。史料缺乏应是学者没有对其重视或着手研究的根本原因。其三，梁末乃至江陵士人不是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个很大的士人流动群。最明显的就是《周书》上的一句话：“褒与王克、刘歆、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①这也是它不能引起学者重视的因素。其四，颜之推和庾信、王褒都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著作或文集，较便于对他们的研究。所以对他们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就较多，^②而其余士人的文字要么很少要么散失，甚至根本就没留下，所以有关他们的研究也就难免阙如。整体来说，涉及江陵士人研究的专著不是很多，但各著作都有自身特点和一定的深度、广度。现有选择地作一介绍。

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一部颇有影响的研究隋唐制度形成的著作，在探究隋唐制度的三个渊源时，他就举证了不少江陵士人对隋唐制度的建设所作贡献，特别是书中对西魏文化制度的论述具有开创性，对笔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永平的《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在从两汉到隋的时间跨度里对汉末士人的流动与刘表政权的兴衰、孙吴学术文化和学风的形成、蜀汉文化的建设以及入晋后南方士人在北方的命运、魏晋南北朝时流亡士人与南北文化交流、入隋江南士人对隋文化和政权的建设和影响等诸多方面作了研究，详细地探讨了士人迁徙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虽然该书对江陵士人北迁涉及不多，但其论述隋政权对陈亡北上南方士人的态度和江南士人对隋政权的影响及文化建设等都为本书提供了一定基础。

① 《周书》卷41《王褒传》，第731页。

② 对庾信研究的专著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对庾信进行整体研究。如徐宝余的《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林怡的《庾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鲁同群的《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钟忧民的《望乡诗人庾信》（吉林大学1988年年版）等。二是对庾信诗文的研究。如杨明、杨焄的《谢朓庾信及其他诗人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许逸民的《庾信诗选评》（巴蜀书社1991年版）。三是对庾信文集作点校和注释。如舒宝章的《庾信选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倪璠的《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谭正璧、纪馥华的《庾信诗赋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对颜之推的研究专著目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颜氏家训》的注释、点校。如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赵曦明的《颜氏家训》（中华书局1985年版），夏家田、夏家善的《颜氏家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等。二是对《颜氏家训》作出一定程度的概括性研究，如刘彦捷、刘石的《颜氏家训注评》（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等。

徐宝余的《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是研究后三国时期士人个案的重要著作,该书把庾信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庾信的“文化特使”作用及其人格与心态、庾信创作风格的演变及庾信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等作了精辟论述,特别是“庾信的人格与心态”一节分别从侍臣与诗人的双重品格、庾信的使者情结、庾信的归隐心理、庾信的乡关之思、庾信的史家意识等角度对庾信个人内心世界进行探讨,对笔者启发很大。

李万生的《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是研究后三国局势发展的一部力作。作者系统地考察了侯景之乱带给后三国南北对立三个政权之间的实力变化,这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李春青的《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詹福瑞、李金善的《士族的挽歌:南北朝文人的悲欢离合》(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李义辉的《中国文人的命运》(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曹道衡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吴先宁的《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出版 1987 年版)等著作对梁末士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这都为本书提供了参考。

相对来说,学界对江陵政权及江陵士人研究论文数量比较多。一方面是对江陵政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如王光照在《后梁兴亡与南北统一》中论述了梁纳侯景导致建康的陷落和萧绎在内争中建立江陵政权又在内争中导致江陵政权灭亡的过程,分析了西魏、北周如何控制、利用后梁政权以及取代北周的隋又是如何利用后梁来取得对南方的统一的。^①他在《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一文里,又详细地分析了江陵政权依靠其固有的军事地理优势和永嘉之乱以来南迁江陵士族获得的逐步成功使江陵政权得以建立并步入“光启中兴”及其灭亡的结果。^②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陈金凤的《后梁政权与南北朝晚期政局》(《唐都学刊》2002 年

① 王光照:《后梁兴亡与南北统一》,《江汉论坛》1999 年第 4 期。

② 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安徽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第3期)和陈世柏的《湘州与梁代政局》(《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是对江陵士人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整体研究和个体研究两类。整体研究的论文不多,仅见牟发松先生的《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载200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文翔实而有条理地剖析了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后北迁到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南方士人的情况,并分析了梁陈之际南人北迁对南朝历史和北朝历史的影响。

在对部分北迁士人作出研究的论文里,于浴贤的《叙梁亡述身世赋作价值的再认识》(《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指出梁亡特别是江陵政权倾覆后南方士人的赋作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表现了这些士人的主体人格意识和精神风貌。韩猛的《梁末入北文人赋作与文人羁宦心态浅析》(《文教资料》2003年第4期)亦从赋作所体现的内涵来揭示梁末入北文人的羁旅和仕宦心态。陈磊的《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则以隋统一后人北南方士人为考察对象(其中也涉及一部分江陵士人),深入地分析了南方士人如何以文化学术影响隋唐统治者思想。周建江的《论北朝社会对入北南朝士人文学的改造》(《黄淮学刊》1994年第3期)则概括性地论述了北朝对南朝士人的文化影响,其中涉及了部分入北江陵士人的命运。

还有一类是对江陵士人的个体研究,主要是对颜之推和庾信的研究。其中对颜之推的研究可分为四类:一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颜氏家训》,主要阐述颜之推的教育思想;^①二是通过对《颜氏家训》的研究来揭示和论证颜之推的思想、人格及其心理的变化;^②三是研究颜之推在文

① 这类文章主要有梁宗华的《继周孔之道绍家世之业——略论颜之推的家教理论》(《民俗研究》2000年第4期),尹坦平的《〈颜氏家训〉的道德教育思想》(《江汉论坛》2000年第1期)等近五十篇。

② 这类文章主要有陈东霞的《试论〈颜氏家训〉中的儒家思想》(《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李宗长的《由〈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心态》(《东岳论丛》1999年第1期),钱国旗的《在礼与情之间——〈颜氏家训〉对礼俗风尚的论述和辨正》(《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等数十篇。